

## 收入、消费与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

王小鲁\*

---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需要进行再平衡。本研究主要讨论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原因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途径。研究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主要表现,是消费率逐年下降并已大幅度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并已过高。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以下方面的改革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支出结构的改善对结构调整至关重要;土地制度改革应与财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继续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与此同时,经济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各项改革,都离不开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未来如果能够逐步推进和落实这些改革措施,将能够大大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也将有效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避免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 收入 消费 经济结构 再平衡

---

### 一 引言

中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需要进行再平衡。目前对此已经大体上形成社会共识。但关于结构失衡是怎样产生的,再平衡主要需解决哪些问题,却仍然有很多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看法。这些问题不讨论清楚,就难以形成有效、一致、完整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难以顺利实现再平衡。本研究主要讨论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原因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主要表现,是消费率逐年下降并已大幅度低于国

---

\* 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wangxiaolu@neri.org.cn。

际通常水平，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并已过高<sup>①</sup>。大规模投资使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消费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投入和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因此出现了相对于供给能力而言的持续的国内需求不足，带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用货币刺激政策和投资扩张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将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如果这种结构失衡状况不改变，经济增长将因为需求不足而逐渐失去动力，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趋势将无法继续。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趋势已非常明显。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明显加快，达到年均 9.3%。90 年代，增长率平均为 10.4%。2001 - 2007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上升到 10.8%。但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就呈持续减缓的势头，2008 - 2011 年平均降到 9.6%，2012 年和 2013 年都只有 7.7%，2014 年降到 7.4%（国家统计局，2014）。增长放缓的外部原因是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出口减速；而内部原因则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内需不足。目前，出口超高速增长阶段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到内需问题上来。

中国的内需不足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表现为长期以来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使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已经过低。在这种情况下靠投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短期化，效果越来越差，副作用越来越大。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过大，而且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收入分配失衡又与一系列体制弊端紧密相关。

近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力度来解决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这些努力已经显现出初步效果。最近两三年来，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加快，大体上赶上或超过了 GDP 增长，从而使最终消费率自 2011 年以来出现了连续小幅回升，2013 年达到 49.8%，比 2010 年回升了 1.6 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情况有所改变，其占 GDP 的比重于 2013 年超过了第二产业（该年第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 10.0%、43.9% 和 46.1%）。

但这仅仅是开始，要实现调整和改革的决定性进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未来这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中，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将逐渐被遏止，而且很可能在两三年后发生增长的再加速，使年增长率

---

① 本文中的消费率定义为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分别定义为按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总储蓄（= GDP - 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占 GDP 的比重。

至少恢复到8%左右。在今后10~2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将仍然有足够的潜力继续保持相对较快的速度。当然,这种乐观情况绝不是靠传统的刺激投资的老办法能够实现的,而要取决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进展。

本文第二部分分析过去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及其原因,探讨收入分配失衡对该趋势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结构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部分讨论适度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的可能性和作用。第五部分简要归纳需要重点推进哪些方面的体制改革来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

## 二 收入分配对消费-储蓄结构的影响

根据中国支出法GDP核算数据,中国在1952-1978年间的计划经济时期,总储蓄率逐渐提高,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从78.9%下降到62.1%。到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消费率一度回升至66%以上,但随后再次缓慢回落,2000年为62.3%。

尤其突出的是此后的10年间(2000-2010年),消费率大幅度下降到48.2%,降低了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46.4%下降到了34.9%,降低近12个百分点。这两者都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低点。储蓄率上升到GDP的51.8%,也是世界上罕见的情况(世界银行,2012)。只是在最近几年,消费率才出现了轻微的回升。图1显示了中国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最终消费率下降、总储蓄率上升的趋势。

图1还显示,资本形成率基本上随总储蓄率的上升而同步上升,并在大部分时间与储蓄率基本重合。但大致在储蓄率攀升到接近40%之后,两者开始发生分离,资本形成率赶不上储蓄率的上升。两者之间的差额,是由净出口来弥补的。而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说明,中国过去一个时期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迫使生产者到国外市场寻找出路,靠拼价格打开销路。而近年来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把依赖超常的出口增长维持高增长的路也堵死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依靠扩张性政策,通过刺激投资来扩大总需求,不仅不能根本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反而使供给加速扩张,导致产能过剩趋于严重。

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的高储蓄率为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高储蓄和高投资无疑是这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储蓄率和投资率已经过高,不能再用旧的逻辑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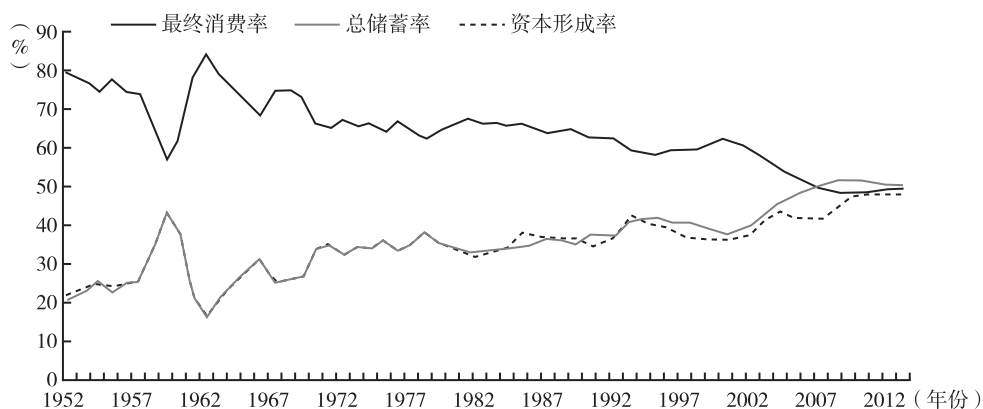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消费率和储蓄率占GDP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

推演。2000年以后，消费率加速下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超常增长，使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从过去的10%左右上升到18%左右，但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加速，相反在最近5~6年间出现了经济增长连续减速。在超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条件下，内需不足在加剧，使得经济效率明显下降，增长动力日渐疲软。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更不是越低越好。

中国的消费率在计划经济时期（1952 - 1978年）的下降主要是政府行为，是中央政府为推行工业化而强制进行资本积累造成的。而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消费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消费率下降趋势，与这期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这期间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使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下降，因此导致最终消费占GDP的份额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状态（Lewis, 1954）。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使城市经济面临“劳动无限供给”的局面。劳动力市场长时期处于饱和状态，会压制非农产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导致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也必然导致居民消费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从1985年到2010年的25年中，这种情况在中国具有典型性。这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8.4倍，而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只增长6.3倍和3.6倍，全国人均消费仅增长4.4

倍（均按不变价格计算）<sup>①</sup>。

最近几年来，上述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尤其是向东部地区转移的速度开始放慢，局部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有学者指出中国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蔡昉，2010）。除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近年来社会保障改善和收入再分配力度加大等因素，也加快了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在2011-2013年期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3%和10.5%（不变价格），超过了同期7.7%的人均GDP增长率。

但是应该注意到，所谓“刘易斯转型”在中国并未完成，还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第一，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还有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农村，虽然青壮年劳动者大量进城打工，但留在农村的中年以上劳动人口数量仍然很大。很多进城打工的青壮年劳动者由于面临户口、社保与福利、住房等方面的制度障碍，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不得不把子女和父母留在农村，而且很多人在城市打工多年后不得不返回家乡。目前劳动力在城乡间转移放慢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是这些制度性障碍造成的。如果这些障碍能够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改革逐渐消除，农村还会有相当多的劳动力可以继续转移出来。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迅速下降，但自90年代中期税改后以来，政府收入增长持续快于GDP增长，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在政府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在2003年到2012年期间，国家预算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以年均22%的速度（不变价格）增长，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从9.6%上升到15.1%；而同期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民生支出增长则相对较慢。这加剧了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不平衡，因此也加剧了总储蓄率不断上升、居民消费占GDP和国民收入份额相对下降的趋势。

第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是导致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富人的储蓄率远高于穷人。表1显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数据，城镇最低收入居民的储蓄率不到7%，而最高收入居民储蓄率则超过了40%。

---

① 人均GDP增长据国家统计局GDP核算数据计算，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统计数据计算（国家统计局，2014）。

表 1 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按收入分组，2011 年）

	最低收入户	较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较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占总户数的比重(%)	10	10	20	20	20	10	10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6876	10672	14498	19545	26420	35579	58842
储蓄率(%)	6.5	20.3	25.0	28.2	31.3	32.8	40.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

从 1985 年到 2012 年，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 0.31 上升到 0.47，已经进入世界上少数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之列。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富人收入增长快于穷人，国民收入的分配向少数人倾斜。这必然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居民收入统计显示，仅在 2000 - 2012 年间，全国居民储蓄率（城乡居民加权平均）就从 23% 上升到 31%。而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同期居民储蓄率从 26% 上升到 40%。

需要指出，收入不平等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实际情况比居民收入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更严重。这是因为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来源不明的灰色收入，并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根据作者基于全国范围城镇居民收入调查进行的研究，城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 10% 的家庭之间，2011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20.9 倍，而按官方统计只有 8.6 倍。高收入居民的实际储蓄率也显著高于统计数据。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与腐败关系极大，并与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相关，包括财税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透明度低、缺乏社会监督，导致公共资金使用不当和贪污腐败；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不善；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导致公共资金大量流失、腐败和不公平的分配（王小鲁，2010；2013）。

第四，中国在改革中，工资水平从政府管制转向了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带来了就业的灵活性和效率提高。但保护劳工的立法，以及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没有随之健全起来。在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显著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近些年来，这方面情况已经有了不少改善，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改善不大。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3 年城镇就业为 3.82 亿人，但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只有 2.42 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为 2.74 亿人，失业保险为 1.64 亿人，工伤保险为 1.99 亿人。上述社会保险对城镇就业人员的实际覆盖率分别只达到了 63%、72%、43% 和 52%。没有被城镇社保体系覆盖的一亿多到两亿人，主要是进城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2014）。由于缺乏社会保障，这些劳动者为了应对未来的失业、养

老、疾病、工伤、子女教育等风险，不得不压缩当前消费，尽量提高储蓄。

第五，各级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追求高 GDP 有强烈冲动，常常为大型投资项目和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对一些垄断性行业提供行政性保护，而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经营环境相对较差，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也因此扩大了收入差距，加速了消费率下降。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推算，在 1998 年到 2008 年期间，全部“规模以下”小型和微型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31% 下降到 7%，“规模以下”企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 47% 下降到 25%<sup>①</sup>。这说明该期间小微企业发生了萎缩。因为小微企业在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减少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最近几年，一般工薪阶层工资收入和农民收入增长相对加快，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公共服务有所扩大，加上农业增收、农产品价格上涨和政府的惠农政策，促进了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和居民消费增长。这使最终消费率出现了小幅度回升。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仅仅是结构调整的开始。

### 三 消费需求不足与结构失衡

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头十年，总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使总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国外市场的需求拉动，导致了结构失衡。特别是在 2008 - 2010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口大幅下滑，促使政府采用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靠刺激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使投资率越来越高，结构失衡明显加剧。近年来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

从 2000 年到 2011 年，中国资本形成占 GDP 的份额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从 35% 升至 48%。其中仅在 2008 - 2011 年金融危机影响期间就上升了近 7 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超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导致的。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元的扩张性投资计划，同时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仅 2009 年一年就增发贷款 10 万亿元，增量是正常情况的两三倍。同时，地方政府纷纷建立融资平台进行大

---

<sup>①</sup> 这期间“规模以下”企业的划分标准是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以下（1998 年数据中未包括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国有工业企业，但对数据影响不大）。这包括了一部分小型企业和绝大部分微型企业。

规模融资，增加投资十几万亿元。这导致了一个时期货币供应极度宽松和投资规模急速扩张，资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

投资高速增长，在短期内的确带动了经济增长，抵消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但事后看，负面影响非常严重。增加投资引起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尤其是像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高能耗的、与投资密切相关的投入品产能，近些年来扩张非常迅猛。但居民消费并没有与投资同步增长，因此消费品行业对生产资料投入的需求相对滞后。一旦扩张期结束，投入品产能的扩张在产业链的中下游就遇到了梗阻，在国内找不到相对应的市场，很快就造成众多行业产能过剩。不同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产能利用率不断下降（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2013）。

为了避开产能扩张的难题，近年来各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房地产开发投入了非常高的热情。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直接导致产能扩张，但这类政府投资同样带动了对钢铁、水泥等投入品的需求，刺激了这些部门的产能扩张。在扩张政策结束后，产能过剩就凸显出来。

2013年10月，《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尽管近年来国务院年年都提出淘汰过剩产能的任务，中国的粗钢产能扩张势头仍然不减，2014年上半年已达到11.4亿吨，超过2013年实际粗钢产量3.6亿吨。这说明过度投资、刺激产能不断扩张的机制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淘汰过剩产能，基本上是扬汤止沸，不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出路，而且这种不断扩大产能，又不断淘汰过剩产能的情况，带来了投资资金和资源、能源的大量浪费。

与此同时，过度投资在房地产业也带来了泡沫，很多城市的房屋空置率过高，新房销售困难，甚至出现了不少“空城”和“鬼城”。在基础设施领域，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少低效或无效投资的情况。

很明显，在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已经非常高的情况下，不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扩张政策来拉动需求，只能有非常短暂的效果，随后供过于求的状况将更加严重。这样的扩张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同时，与高投入相伴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以及资源和环境破坏，也正在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



## (二) 增长乏力和资本回报率下降

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意味着一部分投资成为无效投资。表2对2000-2013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固定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进行了计算和比较。从表中可见,在2000-2009年期间,由于急剧的投资扩张,全国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从9%逐步上升到接近18%,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随后几年增速仍然大致保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同期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明显下降,目前的GDP年增长率比2003-2007年期间降低了3个百分点以上,远远低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这说明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sup>①</sup>。

表2 中国过去10年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资本产出比的变化

年份	GDP增长率(%)	资本存量增长率(%)	资本产出比	增量资本产出比
2000	8.4	9.2	2.16	2.34
2001	8.3	9.3	2.18	2.41
2002	9.1	10.0	2.20	2.39
2003	10.0	11.8	2.23	2.57
2004	10.1	12.6	2.28	2.78
2005	11.3	13.6	2.33	2.75
2006	12.7	14.6	2.37	2.68
2007	14.2	15.0	2.39	2.51
2008	9.6	14.6	2.49	3.61
2009	9.2	17.7	2.69	4.80
2010	10.4	17.4	2.86	4.47
2011	9.3	16.7	3.05	5.13
2012	7.7	16.7	3.31	6.67
2013	7.7	16.8	3.59	7.2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

<sup>①</sup> 资本存量由作者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早年份是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数据)和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以永续盘存法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之所以合并采用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两类原始数据,是综合考虑了两者的口径差异和可靠性等因素。考虑到篇幅有限,这里不做更详细的解释,对1978年以前时期采用了5%的综合折旧率。考虑到改革期间资本折旧加速,设定折旧率从1979年到2008年平滑提高到9.5%。该计算参考了Chow(1993)、张军等(2004)等文献。

表 2 也计算了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GDP）和增量资本产出比（ $\Delta$  资本存量/ $\Delta$ GDP）的变化。这两个指标是平均资本生产率和边际资本生产率的倒数。它们的数值越大，显示资本生产率越低。在 2000 - 2013 年期间，资本产出比从 2.16 上升到 3.59，而增量资本产出比则从 2.34 上升到 7.22。这显示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发生了急剧的、大幅度的下降。

在图 2 中，作者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数据计算了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3 个发达国家（平均）在 1950 - 2011 年这 62 年期间的资本产出比。这 23 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因为资本供给充裕，资本产出比较高是正常的。但图 2 显示，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过去十几年间直线上升，已经超过了 OECD 发达国家的水平。说明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已经低于发达国家。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是不正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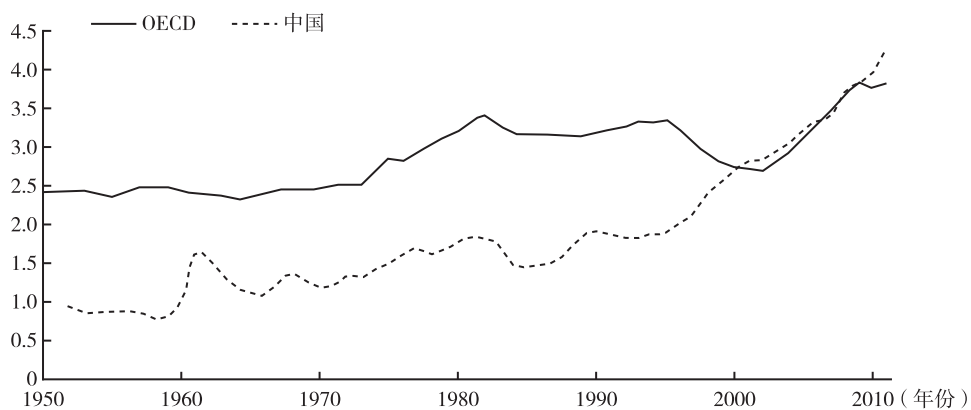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与 OECD 国家的资本产出比长期变化

注：图中中国的资本产出比数据与表 2 数据有一定出入，是因数据来源不同导致的。

资料来源：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数据计算得到（Penn World Table）。

上述情况，除了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过度有关，更与各级政府过份热衷于追求 GDP 增长、过份积极推动和从事固定资产投资有关。很多地方政府往往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而通过减免税、廉价转让土地等方式压低投资项目成本，或者不计成本大量借债进行政府投资，这些都会导致过度投资。如果这些情况不能改变，目前结构失衡和内需不足的状况都很难改变，甚至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增

长有可能进入持续下行、长期乏力的状态，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其一，目前城市化率刚超过50%，城市化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未来还可以有20年的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其二，产业升级换代的进程方兴未艾，服务业发展仍然不足，两者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其三，人力资源素质有待继续提高，技术进步远未达到理想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技术后发优势”。如果能进一步改善教育体制和技术创新体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有巨大潜力。

但要使这些潜力转变为发展的推动力，需要跨越结构失衡的障碍，完成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其中关键在于使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降到合理的水平，促使居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比例，使内需成为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强有力引擎。

#### 四 有没有一个“黄金储蓄率”？

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构成一国经济总需求的，是三个可以互相替代的部分：消费、投资、净出口。当出现总需求不足的情况（总投资 < 总储蓄），导致经济萧条时，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或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私人投资，都能够提升总需求。但由于居民的消费 - 储蓄行为不由政府决定，因此凯恩斯强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着眼于调节投资需求。也就是说，当出现消费需求不足或外需不足时，都可以用扩大投资需求来代替。

中国在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击，出现出口下降、需求减少的时候，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大幅度增加投资，当时也都起到了明显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后一次的大幅度扩张之后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率节节下滑，使我们不得不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中国的远期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反思。

##### （一）投资扩张政策的适用条件

凯恩斯理论在实践中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探讨总投资小于总储蓄的情况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宏观经济分析说明，总投资和总储蓄并非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变量。如果金融市场是充分有弹性的，那么当社会储蓄率高，资金供给充分时，利率会保持在低水平，从而使投资规模自动保持在高位。但如果此时投资仍然低于储蓄，那么这很可能是由于市场饱和，生产能力过剩，投资者没有盈利空间。对中国这样一个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而言，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进行干预，直接扩大政府投资，或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能否创造新的需求？答案是，短期可以。新的投资项目必然产生对投入品的新需求，创造更多的购买力，带动短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因为新的投资项目完成后，生产能力就会扩大。因此在经过了一轮短期的需求扩张之后，未来的供给会进一步扩张。如果此时消费需求仍然不变，或者消费增长滞后于产出的增长，就意味着总储蓄率不降反升，而新的储蓄又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才能与之平衡。于是需要再次启动更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或货币政策。

不需要更深奥的经济学分析就可以直接看出，在消费需求增长慢于投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这种以投资拉动投资的自我循环方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因为政府创造的投资需求只有以几何级数不断膨胀，才能维持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而这种爆炸式扩张很快就会面临政府巨额赤字和高通胀的限制，或者货币政策面临流动性陷阱的限制，使总投资无法继续与总储蓄同步增长。经过一个短周期后，新的总需求不足又产生了，而且可能情况更严重。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常常能够在短期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在中、长期却往往效果不断递减，导致滞胀并存的困难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答案是有的。如果政府只推动基础设施投资，而不影响生产性投资，情况会好得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创造新生产能力，不直接导致产能扩张。在这个意义上，应对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因为财政政策可以局限在基础设施领域，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不分对象地刺激全社会投资，因而导致总供给进一步增加。

但即使是单纯的财政扩张，并只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一个合理的限度。首先，超过实际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导致资源长期闲置和浪费，实际上也是一种产能过剩。这带动的是虚假的 GDP 增长，并不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其次，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必然扩大对投入品的需求，并沿着产业链将需求扩展向上游传递。如果力度很大，也会引发相关行业的进一步投资和产能膨胀。一旦扩张期结束，这些新形成的生产能力也会变为过剩产能。

中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由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近些年来更大力度的基础设施领域也带来了过剩，例如在缺乏需求的地方修建的高速公路、机场等设施。而且大力度的政府投资还一度引起钢铁、水泥等投入品需求旺盛、价格上涨，给这些产业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促使他们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扩大产能。同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给这类投资提供了充分的资金。这是导致这些投入品行业

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

## (二) 有没有一个储蓄和投资的“黄金律”?

上述这种情况,说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并不总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储蓄率越高,要维持供求平衡,所需要的投资率也就越高,生产能力扩张的速度也越快。而同时消费率低和消费增长太慢,不足以吸收产能扩张所增加的最终产品,就会不断形成新的供求失衡。因此在储蓄率高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投资需求无法替代消费需求。

低收入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储蓄率和投资率过低,经济发展缓慢。一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某些高福利的南欧国家,也同样面临储蓄率过低、消费率过高的问题。但今天中国遇到的是另一类问题,即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低效率和社会福利总水平受损。

研究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 Barro & Sala-i-Martin (1995) 证明,在稳态增长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的储蓄率,能够保证长期居民消费水平的最大化。他们称之为“黄金律储蓄率”(Golden Rule Saving Rate)。但该储蓄率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它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等若干外界条件。

这里不必复述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数学推导过程。让我们采用一个更直观的方法,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来考察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假设一国经济由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组成。A 部门为全社会生产消费品,B 部门为 AB 两个部门生产所需要的资本品。整个社会每年将 70% 的社会总产出用于消费,并储蓄 30% 的产出用于投资。因此社会总产品由 70% 的消费品和 30% 的资本品构成。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两个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相同并等同于它们的平均生产率;它们的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也相同;在初始点上整个经济处于供求均衡状态。因此 A 部门应当拥有全社会 70% 的资本和劳动力,而 B 部门拥有其余 30%。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间自由流动。

现在假定由于某种外部原因,全社会的储蓄率从 30% 上升到 50%。消费减少使总需求下降 20 个百分点。消费需求下降首先造成 A 部门生产下降 28.6% ( $0.2/0.7$ ),导致产能过剩、盈利状况恶化。资本和劳动力会根据市场信号,从 A 部门向 B 部门转移,使 A 部门产能收缩,B 部门产能扩大。

不过,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不可能完成,而且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B 部门同样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是因为随着 A 部门的产出下降,A 部门对资本品的需求在经过一段时间延迟后也会按同比例下降,使全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下降 20%。这不仅会迫使 B

部门首先缩减生产 20%，并且会进一步减少 B 部门自身对资本品的需求（ $20\% \times 0.3$ ），使全社会对资本品需求的下降幅度达到 26%。两个部门都会出现产能过剩和生产下降。在第一轮下降中，总需求萎缩了 27.8%（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降幅的加权平均），而由此带来的失业和收入下降，又将导致对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萎缩。如果没有外来因素干预，这种恶性循环将使整个经济陷入螺旋形下降，爆发经济危机。

现在假定政府在第一轮下降后立即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需求。为了补偿此前 27.8% 的总需求下降，使之恢复到下降前的水平，需要把对资本品的需求提高 92.7%（以下降前的资本品需求为 100%）。假设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则总产出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这只是短期效应。大规模投资会带来 B 部门产能急剧扩张。在经济刺激引发的投资周期完成后，总需求不再扩大，而新增产能使投资品供给大幅度上升，远超过危机前的水平。这将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经济会再次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危机。除非全社会的储蓄率能够降低到原来的水平，或者社会能够把一部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并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否则，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中长期是无效的。

现在我们考虑另一种场景，在上述模型中增加一个公共部门 C，并假设政府不采取货币扩张政策刺激投资，而仅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由 C 部门进行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会因投资扩大而增加，但投资不会引起产能的进一步扩大，仅仅改变 AB 两部门的比例关系；经济能够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情况会好于前一种情况。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后，消费需求仍然只占总产出的 50%，另外 50% 的总产出仍然要靠投资需求来实现。而扩大内需的公共投资已经完成，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不可能维持在扩张期的水平，总需求会再次回落。如果社会不能对储蓄率和消费率进行调整，一旦扩张性的公共投资停下脚步，经济还是会再次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困境。这将迫使政府继续依赖赤字财政不断进行投资扩张，最终走向滞胀。

上述分析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消费率和最优储蓄率。如果消费率过高，储蓄和投资不足，会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而如果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会出现总需求不足，同样制约经济增长。在中长期，过低的消费不可能持续地由投资扩张政策来替代。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当消费需求过低时，无论是放松货币供应的刺激措施还是扩大政府投资，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关键的是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来改变过低的消费率。当前在中国，关键在于改善收入分配。这需要改革不尽合理的财政和税收体制、使政府支出合理化，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以改善政府行为并促进要素合理分

配,改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体系,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

上世纪二战前后,所有发达国家都基本完成了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变革,并改善了政府管理。它们在保持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同时,建立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和收入再分配制度,保障了每个公民在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失业和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基本权利。这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内在机制。

今天在某些西方国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即过高的社会福利、以高负债维持的超前消费,以至酿成了一些欧洲高收入国家的严重债务危机。这说明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都是有害的。美国也是一个超前消费的国家,其政府、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债务合计已经达到其GDP的3倍以上,这也是引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但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特殊地位,其货币扩张政策的后果将由全世界分担,使其能够避免债务危机的尴尬局面。

当今世界上,关于公平和效率哪个更重要、公共福利和市场自由哪个更重要,仍然是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正是因为二十世纪在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的变革,才获得了新的生命,缩小了收入差距,减缓了社会冲突,也避免了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不断重演。由此可以看到,公平和效率之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替代关系。一个很不公平的社会必然影响经济效率和发展。在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大众消费不足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时候,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社会公平程度,不仅不会损失效率,反而会促进效率提高,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

最近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2014)的研究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重新出现扩大,财富不平等程度增加。这种情况对经济效率和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也需要指出,这一反向变化在程度上并没有使发达国家回到贫富差距极大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

## 五 靠改革实现结构再平衡

中国在纠正经济结构失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表现在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腐败和收入分配混乱现象受到初步遏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正在改善,最终消费率小幅回升;第三产业增长加快,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速放缓,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等。

这些现象给我们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目前经济增长下行趋势仍在继续，但我们理由相信，未来在经过几年结构调整的阵痛后，中国经济将有能力恢复活力，逐步进入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但前提是结构调整需要持续推进，尤其需要通过广泛的体制改革消除导致结构失衡的制度性原因，从根本机制上促进结构改善。

哪些方面的改革对结构再平衡有重要作用？下面作者尝试对一些需要改革的重点领域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财税体制改革对结构调整至关重要。目前全口径政府收入约占 GDP 的三分之一。公共资金管理有没有一套严格的规矩，钱能否用在该用的地方，对遏制腐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极大。财税体制改革第一要尽快实现各级政府全口径财政公开透明，细化公开内容，强化公众监督。第二应着力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规范土地收入和其他政府收入。第三应制定各级政府行政支出和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控制支出规模；尤其需要减少行政支出和三公消费，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增加和充实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第四要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协调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关系，公平分配财力。第五应改革资源税，开征房地产税和针对垄断利润的税种，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均衡个人所得税税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土地制度改革应与财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的局面。应改革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逐步开放全国土地市场，促进各类土地合理流转，合理调整国家、农民和各类经济实体之间围绕土地的利益分配关系。

需要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简政放权，扩大竞争，减少行政垄断，限制垄断行业的特权，建立和完善市场运行规则，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环境，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

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非常重要，要加快推进，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安家落户、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做到应保尽保，让农村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为城镇化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经济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各项改革，都离不开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首先需要改革现行的行政体制，理清政府职能，消肿减负，建设服务型政府。其次要全面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规则，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防止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并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上述这些改革，大部分都已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有些已经进入实施阶段，有些尚未开始推进。关键在于排除阻力、有效落实。未来如果能够逐步推进和落实这些改革措施，将能够大大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也将有效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避



免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设想在此基础上,在未来若干年中能够把最终消费率从目前的接近50%提高到60%~65%,资本形成率从目前的48%降至35%左右,将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和内需疲软问题,经济效率将显著提高,经济增长将得到更有力的内需拉动,更可持续。加上人力资本贡献和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有希望在未来10到20年的较长时期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样一个中长期的持续增长,将在相对较少的投资、较少的浪费、较少的资源和能源消耗、较少的环境代价、更高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更高的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条件下实现。这将是一个更可持续、更有效率、更理想的 growth 途径。

## 参考文献:

- 蔡昉(2010),《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第4-13页。
- 国家统计局(2014),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
- 世界银行(2012),《世界发展指标》,巴曙松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托马斯·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
- 王小鲁(2010),《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比较》总第48辑,北京:中信出版社。
- 王小鲁(2013),《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比较》总第68辑,北京:中信出版社。
-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第10期,第35-44页。
-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2013),《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程度的量化判断——基于最优投入决策模型》,专题报告,第40期。
- Barro, Robert & Xavier Sala-i-Martin (1995).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pp. 19 - 22.
- Chow, Gregory (1993).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 809 - 842.
- Lewis,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2), 139 - 191.

## Income, Consumption and Rebalance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Wang Xiaolu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Reform Foundation)

**Abstract:** There is a need of structural rebalance for Chinese economy which has been unbalanced in a long period.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manifestation and causes of economic structural unbalance, and policy options for rebalan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key manifestation of structural unbalance in China is that the consumption rate decreased year by year for a long period and is substantially below the normal international rates, and the savings rate and rate of capital formation are too high. The main cause of structural unbalance is high-inequality in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article recommends the following policy adjustments for rebalanc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reform of the land system coordinately with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reforms; market-oriented reforms;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addition, reform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systems should be accompanied with reforms towards democratization and rule of law. Promotion of these reforms step by step should greatly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rebalance the economy to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Keywords:** income, consumption, economic structure, rebalance

**JEL Classification:** J31, D12

(责任编辑: 周晓光)